

《中国学术》十年精选

实践与记忆

刘 东 主编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实践与记忆/刘东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中国学术》十年精选)
ISBN 978-7-100-10167-7

I.①实… II.①刘… III.①社会科学—文集
IV.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7709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中国学术》十年精选

实践与记忆

刘东 主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0167-7

20 年 月第 版	开本 787×960 1/16
20 年 月北京第 次印刷	印张 插页
定价:	元

《〈中国学术〉十年精选》总序

刘 东

越来越显然,已经很少有人不在抱怨那个既外行又强势的学术体制了,却又很少有人能够摆脱它那全能型的“宰制意志”。网上甚至有人用这样的语言,来夸张地形容它那吞噬式的诱惑——“你要我的钱,我要你的命”。正因为这样,也就难怪有年轻学子在模糊的对比中,恍然觉得就连那个战乱频仍、物价飞涨且经常欠薪的民国时代,都要比现在这种窒息的氛围更适于做学问。

可是私下里,自己却在内心中唱着反调:即使在那个思想遭禁锢的苏联,不也还出现了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么?即使在已被炸成残垣废墟的列宁格勒,老肖不还是写出了他的《第七交响乐》么?所以说,相对于“并非衰落”的民国学术本身,我们这一代人更应当记取的,还是当时的学人以内心中的坚持、以“不被决定”的坚毅精神,来守护他们毕生挚爱的学业。设非如此,他们又岂会在如此艰危的时局中,为我们留下了可供承继的一线学脉?

同样的,眼下的这四卷《〈中国学术〉十年精选》,也可以属于一种“未被决定”的“例外”。——这倒不必非要等到后世,大家现在来平心读它一过,也就可以确信无疑地知道,无论当今的学界怎样被批评为“堕落”,但只要哪位学人的良心尚没有跟着堕落,而不在乎短时间是否被承认,不在乎各种以“基金”名义掷下的“封赏”,那么,他就仍然可以做到“立地成佛”,从而以自己坚忍的努力来证明:毕竟在偌大的一个中国,真正称得上“研究”的严肃学术,还不可能被横蛮的外力彻底荡平。

非但如此,在当今的这种环境中,我们还可以趁着全球化的契机,包括

不断扩充的图书馆收藏,快速迅捷的国际互联网,日益密切的学界互访和渐趋多元的财力资源,来向往日的学术记录发起极限冲击。正是上述昔年无法想象的便利,使我们比起前几代的师尊们,有了更加优越充裕的治学条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也完全有理由反过来说,要是我们还没有能把学问做好,那么归根结底,病根还在于自己内心的缺失,——正所谓“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的的确确,随意打开这套《精选》的任一卷,无论是它的《德性与价值》或《实践与记忆》,还是它的《艺术与跨界》或《融合与突破》,都可以看到群星灿烂般的作者群,其中不少还是国际学界的领军人物,注定要被永久性地写入学术史。——而如果再考虑到,他们在这里所发表的论文,都还是经过严格匿名评审、细细切磋打磨的作品,而且这些作品在最初刊发时,按照《中国学术》的操作规程,基本上都还属于“全球首发”,那么,读者们也就不难想象到,当代的知识生产已经走多远了!

当然,还是有必要来预先提醒,由于这只是篇幅有限的选集,规定了每人仅能被各选一篇,所以还只是一番匆匆的巡礼;而读者们如想更多地了解,还只能是经由这里的指南,去阅读更加浩繁厚重的原刊。不过即使如此,这种学术选集的存在本身,却已经可以示范性地证明:如果更相信自己的学术判断,更听从内心学术良知的感召,而不是任由外在蛮力的牵引,那么,尽管我们脚下的土地并不完美,但我们仍可能就在这块土地上,去逐渐打造出一个国际级的学刊,并且就在这样的学刊上,去为我们自己的子孙后代,逐渐苦熬出一种可资承继的学统。

正因此,尽管这里只给出了少量样品,仍希望邀请读者借此鉴定一下,这本学刊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自己在“发刊词”中的愿望:“提升我国人文及社科的研究水准,推展汉语世界的学术成就;增强文化中国的内聚力,促进中外学术的深度交流;力争中文成为国际学术的工作语言,参赞中国文化现代形态在全球范围内的重建。《中国学术》的涉猎范围,囊括人文及社科诸方面,但更提倡此二翼渗透和互动,即人文研究指向社会问题,社科研究显出人文视界,力争以‘人文与社会’为轴心,追求学科交叉和科际整

合。”当然,这决不意味着我已认定,本刊业已切实达到了这个目标,但我却敢向大家这样来担保:无论在过去还是未来的操作中,我们都时刻牢记着这样的目标。

另一方面,读者们还自可明鉴,尽管这里的作者都属于“一时之选”,而且这些作品也都是他们的“精心之作”,但这也并不自动地意味着,他们由此所达到的学术结论,就已经可以代表“真理本身”了。即使我们仍然愿意相信,“真理”这东西总还是存在的,它也只存在于这类学者的艰深对话中,而且这类的对话、辩难与检讨,还将是开放性的和永无止境的。——事实上,就我个人所面临的工作抉择而言,认识到此种“对话性”的关键作用,正是创办这本学刊的主要动力,否则的话,我当初就会把自己主要的精力,投放到多写几本只属于个人的著作。

在这个意义上,创办和坚守这样一本学刊,如果仅就个人的治学而言,或许仍可以算作一种“牺牲”。这是因为,就算是再愚钝再木然,我也并非完全不知道,在验收学术成果的现行机制下,如果太去放纵作为“大我”的想象,那么,对于“小我”只能是有百害无一利。不过,对于这样的一种“牺牲”,我本人却并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这又是因为,从自己的学术训练和学术良知出发,我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了那种“杨朱式的”想象:可以任由中国文化无论变得怎样破败,而只要自己个人作为一位翘楚级的学者,对于它的“研究”还能堪称一流、还能受到认可。

正因为这样,真正要在这里特别感谢的,还是十几年来一直在默默支撑着本刊的、奋勇地冲击在学术一线的作者们。他们不仅以其深湛的求学态度,在共同确保着本刊的论证质量,还更以其职业化的诚敬精神,来忍耐本刊率先实行的、有时难免显得严苛的“双向匿名评审”制度。此外尤其重要的是,他们还更和本刊编者站在一起,拒不相信在这个日渐“扁平”的世界上,还有比学者本身更懂得学术的人,——不管这些人打着怎样令人目眩的名义,也不管这些人掌管着多少令人艳羡的、原应能做点好事的资源。

2013年4月19日于清华园立斋

目 录

史傳德 实际工作中的卡尔·马克思	001
马日诺·普列若 瓦尔特·本雅明与青年运动的体验	026
于尔根·科卡 多元的现代性与协商的普遍性	072
耶尔恩·吕森 危机、创伤与认同	082
克雷格·卡洪 后民族时代来到了吗?	106
苏珊·弗里德曼 定义之旅:“现代”/“现代性”/“现代主义”的 含义	134
阿里夫·德里克 殖民主义再思索:全球化、后殖民主义与 民族	177
杜赞奇 后殖民史学	202
谢里·奥特纳 实践中的文化	219
路德·马丁 认识、社会与宗教:文化研究新方法	243
李湛忞、爱德华·利普马 流通文化	271
王国斌 历史变革和政治可能性 ——中西社会理论的比较	296
王斯福 社会自我主义和个人主义 ——一位西方汉学人类学家在费孝通教授的中西比较中 遭遇的称奇之处和提出的问题	318

郭于华、孙立平	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	338
阎云翔	中国北方农村的个人和彩礼演变·····	366
怀默霆	中国家庭中的赡养义务：现代化的悖论·····	407
孟悦	“世界主义”景观与双重帝国边界上的都市社会·····	430
叶凯蒂	从十九世纪上海地图看对城市未来定义的争夺战···	481

实际工作中的卡尔·马克思

史傅德(法国巴黎第八大学)

一、引言

三十年前,当我还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在一家小书店很偶然地看到了一部马克思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概论》(*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该书分上下两卷,分别于1939年和1941年在莫斯科出版,印数很少。书中的内容涉及马克思1857—1859年的手稿。通读之后,我的感觉首先是为它的气势所震慑,同时也为在这些被马克思称作自省(*Selbstverständigung*)、内心对话、自我诠释的文字中所显示出的那种思想的灵活性所震撼。其次我发现,马克思的这些论说建立在深厚的资料基础之上,其中既包括历史文献,也有经济和政治文献。最后我又发现,这部著作还参考了马克思的大量尚未公布的手稿或工作笔记。当时我想当然地以为这些笔记一定都收藏在莫斯科。不曾想——也是一次偶然的幸遇,在一处很不显眼、几乎被遮蔽了的页边附注中,我发现这些不为人知的手稿竟然就收藏在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写信一问,果不其然!那里的人还告诉我说,这些档案全是对公众开放的,只是从来无人问津。我就专程跑过去看了一眼,结果这一眼就使我和这些档案结下了整整十四年的缘分。

关于马克思,人们熟悉他的《资本论》,也了解他对政治生活的参与,他在共产主义者团体和第一国际中的活动,他在德国流亡者中进行的争论,他反对蒲鲁东、巴枯宁、拉萨尔的斗争——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和政治行动之间的直接关联,以及他的共产主义理论的正面阐述,还有他随时准备

将这一理论付诸实施并迅速完成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姿态。然而,马克思的另一面(这一面他本人不仅从来不曾掩饰过,反而常引为自豪)——他那种明显学者式的独处生活,他的种种研究计划,他的藏书,他的阅读内容,以及由此而来的他的所有精神疑虑、理论风险和思想赌注,几乎全都被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了。

“我是一台机器,注定要辛辛苦苦地去吞噬图书,目的是要把它们以另一种形式扔到历史的垃圾堆上去”——马克思在晚年就是这样谈论其工作方式之特点的。人们刚刚把他个人藏书书目的一大部分发掘出来,共计2000多册,其中德文书占三分之一,法文书和英文书各占四分之一。约莫40000张书页上有他的批注。但这远不是马克思读过的所有东西,因为他还在各种图书馆尤其是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他曾是那里的一位常客)读过成千上万种其他的书籍。

马克思是一个只会在书写中思想的人,不记笔记就读不了书。他的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或者说并非来自神启,而是来自极其广泛的阅读,来自一种系统的、着了魔一样的工作。结果,他留下了数以百计的笔记本,这些资料先是在他最密切的合作者和朋友恩格斯的帮助下被收藏于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的档案室,1933年之后才被转移到阿姆斯特丹社会史国际研究院(IISG)。

马克思的这些笔记本向我们展示的是这位思想家在十九世纪中期从事之思想实验的全过程。首先,它们具有百科全书的特点:涉及的领域包括了哲学、历史学、经济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美学、民族学、语言学、地理学、军事战略学、外交学,甚至还有音乐。其次,它们是马克思的一些完全不为人所知的研究踪迹的系统记录。就政治经济学批判而言,人们可以找到好几种选择,尤其是在有关全球化进程的推论方面。另一方面,马克思还循着黑格尔的一条人们不大清楚的思路,设想了一种法律社会学。他的一些形式上已很完善的文字,已被明确地认为是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和费弗尔(Lucien Febvre)的心理机制(outillages mentaux)及社会事实(faits sociaux)

理论的预示。这里还凸现出一部不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史，一部妇女

史，一部父权史，一部美学提纲。通过这个马克思，我们看到的是一座国际图书馆，是全球化高潮中在欧美社会奔腾激荡的一股思想急流。

这些手稿之所以特别令人感兴趣，是因为它向我们展示了实际工作中的马克思——那是一位思想没有受到任何约束的马克思，他在提出——或者不如说是在提供——各种各样的分析方法，而这些方法至今还不为人们所知。这位马克思讨论的问题，与资本主义由西方到全球的发生和成功息息相关。如今，这位马克思已成为一个政治上独立的国际学界合作研究与出版项目的工作对象，我和巴黎第八大学及柏林科学院出版委员会的一个工作小组目前就在为这个项目工作。

二、实际工作中的马克思

谈到马克思(还有恩格斯)未出版的手稿，人们首先关心的自然是这些手稿涉及哪些领域，里面都有些什么东西，尤其是有没有什么新的东西。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了解马克思的工作方法，更确切地说是要了解他从资料上组织其研究的方式。这工作看上去可能枯燥乏味，但对于理解马克思来说却是必不可少的。马克思不是一个天才，他的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实际上正相反，他只是一个非常用功的读书人。

首先，他做学问时需要使用笔记本，而且主要是他自己亲手缝制的笔记本。提及这一细节可能会显得琐屑可笑，但知道这一点对于我们的研究却是至关重要的。为什么呢？就因为人们已经把那些前后相续的资料连在了一起，去掉了其中原有的纱线、夹子之类所有可能对手稿有害的东西，这样很多笔记本就被拆散了。通过对针洞(这些针洞很不规则，因为全是手工穿的)的办法，我们至少已经部分地把一些笔记本复原了。另一方面，这些笔记本所使用的纸张很大一部分都带有制造商的水印，常常还带有制造日期，这有助于确定手稿的日期，因为它们不可能写于这些纸张的制造日期之前。

马克思用墨水笔书写。用的墨水是黑色的，但这黑墨水今天已褪成了

棕色。随着一种氧化的过程,再加上光线的作用,这墨水渐渐地侵蚀了纸张,以致手稿边缘的字迹已变得不可辨认。这个时期最好的纸张在光线的影响下都会发生氧化并碎裂成灰,十八世纪中期留下的手稿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

人们常说马克思的手稿没法辨读,这纯属奇谈,或者至少是一种夸张。为什么?理由有三。首先,要知道马克思同时代的人都能很容易地辨读他的手稿。只有一点,就是在那个时候,人们用德文写作时用的是我们今天很少人能识别的哥特字体。如果马克思用英文或法文书写,那文字就好读多了。第二,像所有文人一样,马克思也好用个人的缩略词。但这不要紧,只要熟悉了就行。最后,马克思的字写得很小,这是因为当时的纸很金贵的缘故。因此马克思用的钢笔笔尖非常细,一支笔用久了,字迹就会变粗,这时他就会换一支笔以便继续用小字写。事实上马克思手稿中的字迹都是清晰可认的。

另一方面,这种细密、简括但又很清晰的书写,使马克思得以在笔记本中的小小页面上“贮存”下大量文本资料。结果马克思的所有这些手稿虽然内容浩瀚,但占的地方并不大。这些资料保存得都很完整,只是缺了几个本子,但我们也能把它们复原出来(这个问题我们后面还要谈到)。事实上首要的是必须证明,在所有这些材料的细节方面,马克思的手稿与其同时代人的手稿并没有什么两样。

当然,马克思的手稿还是有所不同——因为马克思的工作方式与众不同,而他的那些笔记本的编排方式也最能说明其工作方式的特点。首先,马克思是一个读书狂。一旦他对某个问题感兴趣了,他就会全身心地投入对这个问题的钻研。他会尽可能地找到一切有关的图书,并翻遍相关的期刊。和一种已被普遍接受的观点(而这与他本人也并非毫无干系)正相反,他不仅会参考各古典名家的作品,而且还会参考一些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被边缘化了的作家的东西——这些著作今天已无人知晓,但当时他们对马克思的启示却非同小可。我们以后还会回头来谈这个问题。

马克思的私人藏书有2000多种,这些书他当然可以随意使用。要知道,

那个时候的书是很贵的，马克思为买书花掉了他和他的朋友恩格斯的大部分收入，而每本书在买回后，书名都会被列入他的藏书清单。马克思逝世后，这些藏书就在恩格斯的帮助下转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图书馆，后来就散失了。其中一些很重要的部分，经历史学家汉斯-彼得·哈斯蒂克（Hans-Peter Harstick）协调下的一支国际研究团队的努力，现已在阿姆斯特丹、斯皮尔（Spyre）、柏林、莫斯科和其他一些地方找到了。这些书都带有很多页边批注。

除了使用这些私人藏书之外，马克思还经常出入各种图书馆，主要是大不列颠博物馆，在那里不厌其详地做着读书笔记。其原因似乎不难理解：他手头没有这些书，而他却想在一种思想和理论都改变了的不同环境下，无须重读就能确定无疑地利用它们。不过，有些书（如李嘉图、斯密等人的书）他还是读了两遍甚至三遍，而且每次都做笔记。

看看马克思是如何从他读过的这些文献中获得启示的，人们会感到非常吃惊。马克思读过的这些文献不仅形成了他的思想和理论的材料基础，而且对他起过根本性的启发诱导作用。甚至可以说，马克思的任何一个观点都是有来源的，没有任何无中生有的天才创造，一切都扎扎实实地建筑在他的广博而且全面的阅读基础之上。这样说并没有丝毫的夸张，即使后面我们会看到这种说法尚且存在着的一些缺漏。

换言之，对于马克思来说，阅读以及通过阅读所获得的启示具有关键的意义。例如，1857—1858年间写在七册多大笔记本里的那个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概论》的宏大写作计划（被认为是《资本论》的雏形），其源头就很简单，这是关于一个名叫达里蒙（Darimon）的没什么重要性的边缘文人写的一本书的阅读笔记和批判性评论。但《资本论》这个重大计划就是从这里而不是从古典经济学家那里起步的。另一方面，这项研究计划也迫使马克思重新阅读了古典经济学作品。比如，正是在1857—1858年间，马克思重新阅读了黑格尔，后来还反复读过多次。

在马克思的工作中，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他的笔记本实际上分好几个层次。基础层次是他的读书随记，其内容很接近原文，但也有一些混合着

不同语言的解述文字,其间常常还加入了一些评论从而与原文拉开了一定的距离。第二层次是从这些读书随记中做的一些摘录,内容编排有序,并被赋予某种尚未定型的结构——用这种办法,他一瞥之下就可以对自己读过的东西了然于胸,并随时可以回头重读那些摘自原文的笔记。但有时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就是这些读书笔记的笔记,夹带着各种评论,已远远离开了原文,以至于在马克思发表的文章里出现的一些引文根本就不对,至少和原文不很相符。(此外,那些佚失笔记本的复原工作,也正是依据这第二层次的笔记本来做的)接下来便是第三层次的笔记本,那是一些围绕着某一个他认为合适的原著整理出来的笔记。第四层次的笔记本则是他为自己的原始手稿写的一个索引,目的是要对这些手稿进行重新组织,然后写出准备付梓的手稿——即他的第五层次、也是最后一个层次的笔记本。

所有这些笔记本都是注有日期的。读书随记——也就是第一层次的笔记本——每一本都编了号,而且有日期顺序,即使马克思有时会同时使用两三个笔记本以处理不同的主题。每个笔记本都有一个索引,有时还有一些尚须进一步阅读的出版物的题目。第三层次的笔记本也是编了号的,并注明和第一及第二层次的哪些笔记本相对应。比如,“V,13”指的(直接或间接)是同一系列的第五个笔记本的第13页。在第五层次的笔记本(为出版而准备的笔记本)中,马克思就不再参照自己的读书笔记了,而是直接引用原文,即使那只是依据他的读书随记或索引笔记引用的原文。

由此可见,马克思的这些手稿组织得很严密,形成了一套系统高效的工作机制。在铺展到一张书桌上的时候,这些由多个层次组成的手稿就成了一部阅读记忆管风琴的巨大键盘,可以随时让人查证原始资料,因而也就成了一部写书和编书的有效工具。实际上,这就是马克思所描述的那部机器,它把成堆成堆的书吞噬掉,目的就是要通过思想上的过滤和“消化”,以另一种形式把它们“吐”出来,而在此时,它们就会被赋予马克思自己的批判意义。

马克思的这些手稿按其形式可以分出好几个系列,而这些系列和马克思工作计划的不同时期多少有点对应关系,如:1848—1849年革命前后在

德国、巴黎、曼彻斯特和布鲁塞尔写下的笔记；1850 到 1857 年流亡伦敦期间写下的一系列笔记，在 1859 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出版之前于 1857—1859 年间写下的手稿，此外还有一系列与马克思从 1867 年开始发表的《资本论》有关的笔记，那实际上是这部巨著之手稿的基本资料依据（《资本论》共有四个不同版本，其中德文版本两个，法文和英文版本各一，而所有这些版本使用的笔记资料都还是人们不曾见过的东西，尽管后来又出版了恩格斯编辑的《资本论》第二、三卷，以及好几卷以《剩余价值理论》（*Theorien über den Mehrwert*）之名而流传于世的著作）。其他一些写于十九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的笔记系列，主题已与政治经济学无关，涉及的是另一些研究计划，包括那个著名的世界历史研究计划（马克思为之在 1880—1882 年间写下了好几巨册约 1200 页的笔记），其内容也是既鲜为人知，又令人咋舌的。

三、编辑问题

这里不是讲述马克思和恩格斯手稿编辑史的地方。我们只需记住这一点：写出这些笔记本的马克思在思想方面完全是无拘无束的，一点也不讨心怀猜忌的政府机构的喜欢，以至于他们手稿的编辑工作经历了一个两起两落的过程。第一次的计划是编一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arx-Engels-Gesamtausgabe*，简称为 MEGA1），那是在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由莫斯科马列主义学院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社会研究所合作实施的。这两个机构，前者从属于苏联共产党，后者则是个教育机构，在政治上是独立的，但为自由马克思主义思想（Karl Korsch, Theodor Adorno, Max Horkheimer 等人的批判理论）所裹挟，并且与掌握着所有这些编辑过和没有编辑过的手稿的德国社会民主党（SPD）有联系。基于这一合作框架，莫斯科马列学院院长大卫·李阿扎诺夫（David B. Riazanov）于 1927 年开始编辑《马恩全集》第一版。原计划出 42 卷，1935 年出了 13 卷后出不下去了，因为李阿扎诺夫本人在三十年代的大清洗中消失了。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共产

党

对

出版这些手稿没有表现出什么特别的兴趣,由此看来1939年《政治经济

学批判概论》能够在阿多拉茨基耶(Adoratskij)的主持下出版,算得上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

1933年德国纳粹上台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档案资料全都被秘密转移到了国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手稿则被转移到了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史研究院,该机构是历史学家波塞穆斯(Posthumus)创立的,没有任何政治背景。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柏林和莫斯科的一些只愿意编像《马恩选集》(*Marx-Engels-Werke* (MEW))这种大众读物的马列学院,终于开始注意提高他们的科学水平,决定编辑出版一套新版的《马恩全集》(以下简称 MEGA2)。为此他们和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史研究院签订了一项合同。德国和俄国的编辑人员们都是马恩手稿的专家,在一些特别的学校接受过专业训练。这个版本注释不详,导读文字还带有政治上的框框。根据编者宣布的意向,编这一版《马恩全集》的目的,就是为发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攻势”服务的。这个意思在这套书的所有导言和注释中都有清楚的显示。不过,当时东德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们也并没有对这套马恩全集的编辑工作表现出过多的热情,实际上这个工作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在教育界的历史学家们的支持下完成的。

1989年政治变化的发生,导致这项编辑工作的基础突然坍塌。两国共产党的马列学院都宣告关张,编辑们拿不到工资了,参与这一工作的学界人士们也都丢了饭碗。在这一情况下,阿姆斯特丹社会学国际研究所提出动议,建立一个国际基金会,叫作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nternationale Marx-Engels-Stiftung* (IMES)),以保证马恩手稿出版工作继续进行,而这项编辑工作今后将由柏林、莫斯科、波士顿、巴黎和东京的一些研究团体来承担,并由新成立的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来统一协调。那些研究团体在日常工作中将通过一个高效率的互联网来保持联络。经过了一些独立的评审程序之后,如今这项编辑工作已被确定为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的一个重点项目,并得到了来自德国、荷兰、美国、日本的大量政府和民间的资助。

1994年,一个国际历史与批评编辑专家小组经过研究,对编辑工作的